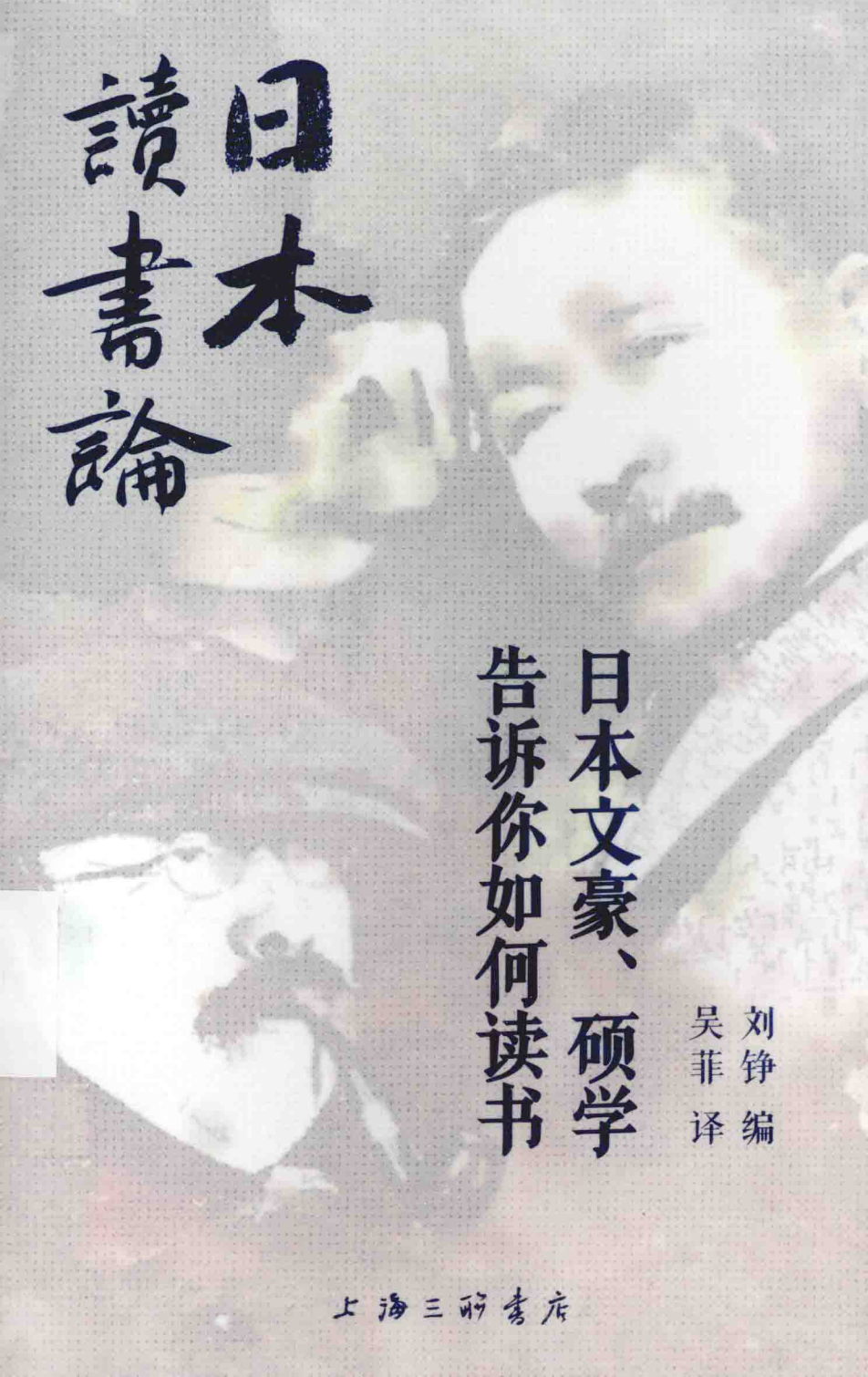




日本 讀書論

日本文豪、碩學
告訴你如何讀書

劉錚 編
吳菲 譯

上海三聯書店

日本讀書論

刘铮 编
吴菲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读书论/刘铮编;吴菲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4. 8
ISBN 978-7-5426-4682-8

I. ①日… II. ①刘…②吴…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
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7717 号

日本读书论

编 者 / 刘 铮

译 者 / 吴 菲

责任编辑 / 彭毅文

装帧设计 / 王丹青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字 数 / 165 千字

印 张 / 10.125

书 号 / ISBN 978-7-5426-4682-8/G · 1329

定 价 / 38.00 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导 言

劝人读书，是件特别腐朽的事儿。

说它腐朽，是因为劝人者往往并无资格。假道学讲仁义有多讨厌，见识浅的村学究、腹笥虚的教书匠劝人读书就有多烦人。劝人者究竟读不读书呢？假如自己并不躬行，那么他的话自然没有说服力；若是自家读得勤勤恳恳，我们倒要笑他：读了如许书，成此一腐儒，读书又有何用？

它的腐朽，还表现在劝人者的天真上——竟以为在提交合法性证明前，就可以把读书是有益的这一命题当成真理，硬塞给年轻人，岂非以青年为不晓事？其实，读书的合法性是青年一贯质疑的对象。孔子的弟子子路就辩称：“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可见，这种质疑是有传统的。劝人读书的传统有多长，质疑读书的传统就有多长。

一 何谓“读书论”

所谓“读书论”，就是围绕读书这个话题展开的论述，通常，以“读书法”的面目出现。不过，如果说读书法是读书的方法论解说，那么，读书论确实也应该有它合法性证明的部分。

但是，读书这件事儿，几乎是无法站在它的外部来说它的好处的。读书就像游泳、骑自行车一样，它的有意思，是从你投身其中的那一刻开始的。因此，读书的合法性证明常常就寓于它的方法论解说中，你知道怎么读书好了，你也就知道读书好在哪里了。三木清说，有读书习惯的人，能从读书中找到与别不同的乐趣，而这种乐趣又使他不能不读书。这就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闭环：从读书到读书的乐趣，再从读书的乐趣到读书。所以，古往今来，肯停下脚步来听听劝人读书者的话的，一般也就是那些本来便是读书人的人了。而读书论的读者，当然，也主要是那些本来就愿意读书的人。

如此一来，如何撕开这一闭环，如何让在读书的圈子以外的人也明白读书（可能有）的意义所在，就成了一个关键的问题。

试着去思考这一问题(可能有)的答案,正是编选《日本读书论》的出发点之一。

二 大正时代的特殊性

入选《日本读书论》的文章,除了夏目漱石的一篇,均写于大正时代到昭和前期这段时间,即 1912 年至 1950 年这段时间。

大正时代,碰巧是跟中华民国同时开始的,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个特别值得玩味的时代。日本有句成语,叫“猪突猛进”,大正时代正是一个在文化上“猪突猛进”的时代。一方面,明治以来吸收洋学的成效在此时发酵完成,另一方面,承继自江户时代的汉学传统遗风未坠。大正时代,是活泼泼地从西洋、东洋两个文化体系中肆意撷取的时代,这种左右采获的欣快感及均衡感,在日本的历史上也是独此一时而又昙花一现的。

从政治背景上看,就在大正时代开始前的 1910 年、1911 年,有所谓“大逆事件”。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法西斯势力抬头。大正文化,可谓是在两个深谷间的一峰突起。这种政治上的短暂宽松、文化上的“猪突猛进”,与

几乎同时的德国“魏玛时代”有相似之处。它的灿烂与它的短暂，互为表里，互为因果。

三 “教养主义”的真髓

战后对大正文化的回顾总结，有“大正教养主义”的提法。“教养主义”一词，确能道出大正文化优点、缺陷之三昧。

教养，当然来自德文 Bildung 一词。事实上，大正时代的教养主义，就脱胎于德国式的对教养的理解与憧憬。

三木清的文章《读书遍历》中对“大正教养主义”有极深刻的评说：

首先，那是个勇于冒险且积极向上的时代，那时候学生普遍对政治抱有强烈的关心……然而紧接着的是与之相反的内省且充满怀疑的时期，就是在这样的风气中，所谓“教养”的观念在我国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因此这种教养的观念就其由来而言是文学乃至哲学性的，而不包括政治性的教养，毋宁说是政治因素作为外在的东西被有意识地除去并排斥了。教养观念的形成主要源自漱石

门下那些受到科培尔博士影响的人们。阿倍次郎的《三太郎的日记》是其中的代表性先驱，我也曾在宿舍熄灯后的烛光下耽读此书。

.....

虽然遇上那场名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事件，我们对政治却毫不关心，或者说是得以毫不关心。而后支配我们的反倒是那种“教养”的思想。并且这种思想有着轻政治而重文化、反政治乃至非政治的倾向。是一种文化主义的观点。所谓“教养”的思想是文学和哲学式的。这种思想特别重视文学和哲学，轻视科学和技术等，将之看做是不属于“文化”而属于文明的东西。换言之，大正时代的教养思想是作为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以福泽谕吉等人为代表——的反动而兴起的。这就是在我国“教养”一词所拥有的历史含义。只要词语这东西不能脱离历史而存在，就算在今天这种含义也是必须注重的事实。

这两段文章的内涵极丰富。从事实层面上讲，三木清指出，在东京执教的德国人科培尔博士对日本“教养主

义”的形成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教养主义”这种文化理想，是像打青霉素一样，从外部注射到日本的文化肌体里的。其次，三木清提到了“大正教养主义”最具代表性的读物——《三太郎的日记》。按照斋藤孝在《读书力》(2002)一书的说法，“教养主义的代表作品有大正三年出版的阿部次郎《三太郎的日记》、大正六年的仓田百三《出家及其弟子》、大正八年的和辻哲郎《古寺巡礼》、大正十年的仓田百三《爱与认识的出发》以及西田几多郎《善的纯粹经验》”。正如三木清总结的那样，“教养主义”的总倾向是思想性，因此，我们丝毫不奇怪地看到“教养主义”代表作品的作者都是思想家，甚至是哲学家。

德语翻译家高桥英夫在他的文章《德国近代思想与日本人》(见芳贺彻编《翻译与日本文化》，山川出版社2000年版)中提到一件好玩的事。说是兵库县篠山地方原来有一首民谣，开头一句唱的是“でかんしょ”，发音近似中文的“笛康叔”，旧制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简称“一高”，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的前身)的学生就把这首民谣借用过来，在同学间广为传唱。在他们口中，这个“笛康

叔”，就成了“笛卡尔、康德、叔本华”的缩略语。在今天，这恐怕是不可想象的：还未正式升入大学的预科生，把笛卡尔、康德、叔本华的著作当成他们的日常功课。高桥英夫本人就是“一高”的毕业生，他谈到的这则轶事充分体现了“大正教养主义”偏重思想性到了怎样的程度。

在本书的选目中占有相当分量的作者三木清、户坂润、桑木严翼，都是经大正时代成长起来的哲学家，他们的文字正是这一德国味儿的、偏思想性的“大正教养主义”的果实，也可以认为，就是具体而微的“大正教养主义”本身了。

那么，这一“教养”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是什么样的呢？正是像三木清他们那样优游于世界文化的遗存之中。他们是在文化的峰巅上行走的人，每一步都踏在第一位的文哲经典上。而且，并不是只有哲学家才在“大正教养主义”的氛围中浸淫过，许多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像本书的作者之一、数学家小仓金之助，像儿科医生松田道雄（在中国，以极受欢迎的《育儿百科》一书闻名），都在回忆文章中详细铺述了自己阅读西方文化经典及“大正教养主义”代表作品的经历。就其共性而言，他们

是大嚼大咽经典名著的一代。

四 “教养主义”的内侧

为什么今天我们无法再要求下一代青年大嚼大咽经典名著了呢？这就涉及“大正教养主义”的一个隐含着的前提。那就是，这种“教养”，从本质上说，是为精英阶层设计的，历史地讲，也是只能属于精英阶层的。我们应该看到，“大正教养主义”，其实是与日本的旧制高等学校、帝国大学这套教育体制扭结在一起的。东京的“一高”和京都的“三高”，尽管人们很少正面提及，但显然，它们是精英的摇篮，而且只是精英的摇篮，它们把全日本最有学术潜力的青年集聚起来，让这些青年栉沐于文学、思想的精华。他们是最得益于这种“教养主义”的一群。对于那些资质、才性尚未得到有效开发的青年来说，“教养主义”式的学习是困难的，同时也是奢侈的。

“大正教养主义”的终极“产品”，是一群“知识贵族”。就知识的层面而言，只有“知识贵族”的知识才有意义；知识，不是搞救济，也不能讲“平均主义”。但站在整个社会的角度上看，“教养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是披沙拣

金、“浪费式”的，与民主化潮流相悖。三木清说大正时代的教养思想是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的反动，其部分含义也在于此。

一般认为，日本教养主义的消亡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参竹内洋《教养主义的没落》，中央公论新社 2003 年版）。不过，事实上，教养主义的式微要来得早得多。战后，日本被美国军队占领，美国式的消费主义文化和民主主义思想同时冲击着日本的固有思想体系，而这两种因素恰好都有对教养主义的腐蚀作用。1947 年，在岩波书店的《西田几多郎全集》第一卷正式发卖三天前，就有热心的读者带着铺盖卷儿在岩波书店营业部的门外露宿了，为的就是尽量早地买到这位哲学家的大著。1947 年 7 月 20 日《朝日新闻》刊出的照片上那一溜儿铺盖卷儿，让人看了感慨万端。这当然是“教养主义”理想鼎盛之时，然而，世事总是这样的：鼎盛之时，往往紧接着强弩之末；一事情，一旦显得荒唐，离它的崩溃，也就不远了。

三木清在评说中还提到了“大正教养主义”的另一缺陷，即对政治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回避。应该说，这跟日本当时的政治气候有一定关系。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在

德国式的教养理念中，个体生命的完善，总是被放在最突出的位置上。也就是说，个人的才能的发展、精神的提升、美的享受，是这种教育的核心内容。政治，即与他人、群体、社会的关系，是被忽略的，这内在于、隐蔽于精英教育的理念当中。

三木清所谓的“政治”，不管是马克思主义所代表的左翼政治，还是法西斯主义所代表的右翼政治，恰恰都来自推崇“教养主义”的这个精英群体之外，给这个精英群体造成极大冲击，因为马克思主义也好，法西斯主义也罢，都是底层要求的体现，是底层力量的外化，像火山熔岩一样，要从下面涌出来，把这个“精英”的顶掀掉。

稍有不同的只是，马克思主义，从思想的角度上讲，是在德国式“文化主义”的延长线上的，尽管它的精神是激进的，但其学术形式依然可以沿着“教养主义”的路子过渡过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大正教养主义”时代的思想家可以不怎么费力地在纸面上转投到 20 世纪 30 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热潮中来。从这一点倒也不难看出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的软肋所在：他们是把马克思

当成笛卡尔、康德、叔本华那样的学问来研究了，到头来，顶多只能做个藏书室中、扶手椅上的激进分子了。

五 “教养主义”的新义

既然，像上面讲的，“大正教养主义”有这么多问题、这么多缺陷，那么今天我们在谈论读书法的时候干嘛偏要去重提这一“教养主义”？我们在这里讲的“教养主义”，又与那种在通俗文化中被宣扬的、显然是“腐朽”、“反动”的教养概念有什么不同呢？

森鸥外写过一篇自传性的小说，题目叫《性的生活》，里面有一节讲年轻的主人公和他的同学古贺在宿舍里闲话。古贺发现书桌底下放着一套书，就问：

“这是什么书？”

“《贞丈杂记》。”

“写什么的？”

“这里写的是装束的事情。”

“读这种东西做什么呢？”

“不做什么。”

“读那玩意儿不无聊吗？”

“那你说我们进学校求学问不无聊吗？又不是要当官、要当老师的。”

“你毕业后不当官、不当老师吗？”

“嗯，那也未可知。不过，求学问不是为了那个。”

“那对你来说，学问就是为了‘知物’，总之是为学问而学问喽。”

“嗯。啊，算是罢。”

“唔。你真是个有意思的小子。”

《贞丈杂记》是日本江户时代的随笔，想来属于《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一类的读物罢。读它做什么呢？不是为了装点门面，饰高深以震俗，也不是为了积累“文化资本”，把读书当作在“文化场”中进行“象征投资”的一种策略，当然，更不是为了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各种好处，甚至不是为了愉悦，不是为了罗兰·巴特式的沉溺于文本的“醉”。那究竟读它是想做什么呢？读它——套一句早已用滥的话——因为它在那里。

这种阅读，并不是漫无目的的，它有目的，可是，它的

目的，并不是摆在桌面上可供随时取用的。往终极里说，它的动力就是人类的好奇心。我为什么要知、要探索、要思考，而非浑浑噩噩地苟活于世？没有什么为什么，我只是单纯地不甘止于此而已。我总要到外面去，到我上面去，到我深处去，这不满足于我、不停留于我，正是最能定义我之为我的那个东西。

六 刷新“教养主义”

或曰：且勿为此迂远之论，何不示我以途辙？是的，在今天，人类知识和思想的整个存量似乎已在互联网上一览无遗了，可是这个存量实在太太，大到无法用个体生命来丈量，也就是说，我似乎已不可能只由好奇心或飘忽的兴趣来引导我的阅读了。“修养”与“读书法”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空前地尖锐了。我们似乎没法在不谈“读书法”的前提下来谈“修养”了。

说到底，什么是“读书法”？读书法，不过是我们对知识库存和思想物流业所做的一种经济学算计，是我们对知识堡垒和思想弹药库发起奇袭时的一种谋略。当然，这种算计或谋略，首先是为了自己的——“古人之学为

己”的那个“为己”。或者说，是我们对如何武装自己所制定的计划及步骤。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三木清所说的：“不存在脱离各自不同性格的读书技术。读书法对每个人而言是具有个性的。因此最重要的是我们应各自开发最适宜自己的读书法。在读书的技术上，人必须具有各自的开发精神。”

再没有一种现成的计策、方略、蓝图，可供我择取，能适合我刻下的任务了。认识到这一点，乃是阅读前的破釜沉舟。我们是要对大正时代的“教养主义”点一次“刷新”才行了。我们要的“教养”，不是那传承百代、人家早给我们规定好了的“教养”。我们是要以“大正教养主义”式的广阔胸襟，到古今知识与思想的深渊薮泽中，去抓取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一份。

七 经典的圈定

可是，说“去抓取我们自己想要的那一份”，好像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已经明明白白、板上钉钉了似的。不，“读书法”这种东西之所以还一直存在，没有给扫到历史的垃